

中华文化与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凝聚力^{*}

丁 宏

本文从中华民族整体观出发,通过阐释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传承和弘扬,探讨了中华文化对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凝聚力的重要影响,以此彰显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丰富内涵以及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海外华人 少数民族 中华文化 凝聚力

作者丁宏,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1。

今天的“华人”是中华各民族共同享有的称谓,其含义赋予了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成分的内涵。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以中原“华夏文化”为核心的族类观和基于“五方之民”的“华夷”分类框架,而“华夏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汉族通常以“华夏人”自居,所以“华人”也往往成为“汉人”的同义词。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所谓“华夏人”或“华夏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历朝历代不断有“夷”融入“华”,而“华”的边界由于“夷”的加入不断扩展。在王朝兴衰嬗替的历史进程中,“华”“夷”互动始终未绝,“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①“华夷一体”“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所表达的其实就是中华各民族是一个共同体的观念,这也是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讲道:“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②从“五方之民”到“中华民族”,反映了各民族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所以从中衍生的“华人”概念自然应该包含各民族的成分。著名海外华人研究学者王赓武讲过,“在外国人的文献里只要是从中国来的人都叫做 Chinese,那个地方就是 China”,“但是怎么翻译这个 China 和 Chinese,现在有许多困难。最后我们习惯地用‘华’字”,“因为用这个‘华’字表示的并不一定仅指汉人,也可能是满人。到海外去的那些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1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7日。

②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所谓‘华人’基本上是汉人,但也有少数民族,也有回族或满族,所以不能叫‘汉人’,就叫‘华人’”。^①

遍及世界各地的几千万海外华人,在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华人”“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属性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各民族海外华人进一步将这样的结果在世界各地播撒,从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丰富内涵和文化价值。本文正是从中华文化对于提升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凝聚力的重要意义出发,针对以往海外华人研究主要聚焦“汉人”而对少数民族关注不够的现状所进行的一种必要“修正”。希望通过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形成中华民族整体观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话语体系。

一、“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概念辨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②与主要经过海陆迁往东南亚等国且以汉族为主的海外华人相比,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多居住在我国周边地区,又多从陆路迁移国外,所以往往将他们归入跨国(界、境)民族研究领域。^③目前,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人数的数字,^④其原因与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身份界定有很大关系。

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在身份界定上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中国之外,‘民族’并不一定等同于中国民族识别所确定的民族,即汉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⑤所以有人说“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被遮蔽在海外华侨华人之中,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呈现,而在中国民族的海外移民中却被遮蔽”。^⑥这种所谓“遮蔽”,一方面彰显了海外华人研究作为一门“显

① 王赓武:《中国情结:华化、同化和异化》,《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② 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成果有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现状与历史的分析》(《八桂侨史》1993年第3期)与《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不容否认和忽视的领域》(《八桂侨史》1993年第4期),李安山《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特点、辨识标准及人数统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论文。赵和曼《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是第一部全面讨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著作。除综合性研究外,一些专题性讨论也较有代表性,如谭天星《“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初探——以新疆、云南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梁茂春《具有中国血统者就是华人吗?——美国赫蒙人之案例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等。此外,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回甘回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丁宏《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琪《中亚维吾尔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几部专著,是对某一民族海外华人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相关讨论可参见丁宏、李如东《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的资料梳理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③ 虽然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与跨国(境、界)民族多有重合,但后者强调的界、境、国也与现代意义的国家划界有关,其中有自然、被动的因素;而前者更多强调“移动”,虽然旧时也有因为天灾人祸被迫迁移的原因,但主观、主动因素往往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从中国迁移出去的少数民族。由于边界划分形成的跨国(境、界)民族与迁移流动形成的“少数民族华人”往往在族别上、所在国的身份认定上有同一性,这使得二者常常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此部分内容参见黄文波《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国民族区别刍议》(《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关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数字估计,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存在几个数字:310万人(参见向大有《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八桂侨史》1993年第3期)、570万人(参见李安山《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特点、辨识标准及人数统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340万人(参见赵和曼《试论海外少数民族华人的若干特点》,《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据中国网(网址: <http://roll.sohu.com/20120424/n341488495.shtml>)2012年报道:“中国侨联在近期的侨情调研中了解到,少数民族海外侨胞总人数约有三四百万,占全部海外侨胞的10%左右。”(发布时间:2012年4月24日)以上这些数字只具有参考价值。事实上,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多,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数也在不断变化,很难精准确定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具体数量。

⑤ 陈志明:《一带一路、中亚与海外华人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⑥ 陈宇:《我国陆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及其未受重视的原因》,《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学”的强大影响力和包容性,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也在融入海外华人研究的理念之中,从中华文化“大视野”对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研究也就更显必要。

英国学者艾琳娜·巴拉班特斯瓦(Elena Barabantseval)在《谁是“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中国对跨国民族体的追寻》一文中就讨论了“少数民族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这一术语在中国官方学术与政策讨论中出现的原因、方式及其含义,指出“少数民族身份范畴已被纳入海外华人的讨论视野下,并促使中国政府努力克服海外华人研究中存在的‘汉族中心主义’和动员海外汉与非汉华人跨国性的‘民族团结’这样的双重问题。这些跨国努力更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和凝聚力。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成为中国民族与文化多样的象征,那么‘海外华人’的概念则被长期建构为中华民族的延伸,象征着中华民族绵延、团结与薪火相传”。^① 这里的“中华民族绵延、团结与薪火相传”阐释的正是要通过各民族海外华人,在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凝聚力、影响力。

上文提到的“非汉华人”也被用来涵盖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群体。2014年4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和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联合举办了有关“中国海外非汉族裔侨民群体”(Non-Han 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beyond China)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但此概念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排他性。^② 目前学界比较普遍使用的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用法。这种用法非常符合我国从政治、法律意义上对“华侨”“华人”的清晰界定,即前者强调其仍然保留着中国国籍,而后者则已经属于所在国的公民,这种区分包含着国家政治身份属性,强调其离开中国本土但源于本土的身份界定。本文之所以从民族学学科视角使用“少数民族海外华人”这一概念,主要是鉴于海外华人已经是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显学”,包括一些国际性机构,如“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WCILOCS)等,^③都使用“海外华人”名称,同时希望能够将少数民族的视角纳入海外华人研究中并弥补其忽略“少数民族华人”的不足。本文界定的“少数民族海外华人”,指移居到其他国家的中国少数民族及其后裔,其祖籍国是中国。

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点的形成及时空延续性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文化聚合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奉行“多民族”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大多数统治者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强调“华夷一统”“和而不同”“依俗而治”,客观上创造、积淀了为各民族普遍认同并共享的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④ 中华文化被各民族广泛接受、认可,就是因为她本身就是由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凝聚而成,具有多样性色彩。“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应当认识,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

^① Elena Barabantseval, "Who Are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China's Search for Transnational Ethnic Unity," *Modern China*, Vol. 38, No. 1, 2012.

^② 张振江:《为什么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林晓峰、方勇主编:《“一带一路”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页。

^③ 李安山:《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7日。

族、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她不但有自强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气度、灵变的智慧”。^①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形成于各族人民相融共生、休戚相关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但又丰富多彩。我们强调汉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凝聚的核心作用,但“汉文化”也是在吸收、融入多民族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各民族之间,“多元”与“一体”之间都存在着内在关联性,不能割裂。如果将这种“多元”“多样性”“简化”甚至“窄化”为“汉文化”,或者仅仅是儒家文化,^②则不符合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该文引发一场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学术争论,其中费孝通先生发文提出不同观点,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多样性现实。这场讨论有其当时特有的历史条件。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立论初衷,更多是为了凝聚力量共同对外,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后来也有论及。^③顾先生所指的“中华民族”事实上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综合概念。正如他在文中所阐释的:“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家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大家涵濡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如果用文化的方式来分,我们可以说,中国境内有三个文化集团”,这就是“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这三个集团都没有清楚的界限而且是互相牵连的”。^④顾先生的观点其实也是在强调中华民族是“多元和合”的共同体,而中华文化的形成也是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展开的,儒家文化、(藏传和汉传)佛教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以及少数民族的多种文化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华文化由各民族共创、共享的历史事实出发,“海外华人”这一概念应该宽泛地用来指涉属于中华文化体系的各民族海外华人群体。此外,如果我们从宏观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的海外移民史,也不难发现,如今的各民族海外华人是在连续相关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元、统一的政治格局,通过土司制度、羁縻府州制度、册封制度以及伯克、扎萨克制度等,将西南、东北、北方诸民族及西藏、新疆等纳入“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框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新格局。可以说,中国的海外移民不仅跨越了从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变,也构成世界移民史的一部分。故此,我们在讨论海外华人的时候,要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视角及更为广泛的世界移民史语境中考察,特别要注意中国各民族海外华人在历史文化层面上所具有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有助于我们突破“民族识别”的界定框架在讨论少数民族海外华人时的时空、概念局限。

国家认同或国籍认同具有可变性和流动性,而民族、文化则具有先赋性和内生性。中华文化累积了各民族的智慧和创造,这种融入民族血脉、维系民族延续性的积淀,是中华各民族共享的记忆和资源。遍及世界各地的各民族华人,他们拥有共同的“华人”身份、“华人”文化。我

① 《〈甲申文化宣言〉:文化主张》,《中国文化产业》2005年第3期。

②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在2015年在上海图书馆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就是“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他说:“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产生误解。”参见凤凰网(网址 <http://culture.ifeng.com/>),浏览时间2020年3月25日。

③ 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④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34—43页。

们常常讨论全球化对于民族文化的影响,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文化的全球化”,这个过程一方面缘于全球化过程中的人口迁徙与流动,另一方面,文化之间的频繁碰撞、密度交融也带来了文化扩散过程中移民对于文化传统的守护和追求。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该民族对于世界的历史、情感认知,积淀着其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而如果离开了文化母体、割裂了文化血脉,必然会迷失自我、丧失根本。各民族海外华人,他们在地缘上背井离乡,在政治上认同所移入的主权国家,但他们在精神上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固有文化的信念与影响。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海外华人的文化血脉。各民族海外华人,恪守、承载着各自的华人文化,这些多元的华人文化是“一体”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多样性所呈现的华美色彩及共属中华的“一体性”所具有的聚合力,凝聚了全世界各民族海外华人,使得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屹立在世界舞台,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三、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实践

中华民族长期的融合发展过程是“多元”与“一体”的辩证运动过程,缔造了悠久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伟大历史。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即是对这个过程的恰当总结,其重要意义在于该理论摆脱了血缘与特定客观文化的羁绊,将中国境内各历史人群都纳入“多元一体”的框架中,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涵盖最为广泛的历史凝聚人群基础。该理论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建立在中国各民族在最高的历史文化认同层面上趋于一体的客观历史发展趋势上,最终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多层动态网络模式成功解决了融多元于一体的理论难题。这一理论突破既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现代主权国家理论提供了新的范式,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民族主义的超越。^①

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理论的“一体”立足于国家利益。如果从“华人”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华人”既包含中国各个民族,也包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民族海外华人,他们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的表述也许不完全一样,但其共同的“华人”身份使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超越了现代国家的概念,在文化的角度形成了更广阔意义上的“多元一体”。关于这种认同的超越性及多重、多层次性,学者讨论颇多。麻国庆从多层次记忆的角度分析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以及环南中国海通道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记忆,指出前者是现代国家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记忆,后者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中华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记忆。^② 张小军提出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包括三重结构: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将三重结构的中华民族差序格局联系贯通起来的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原动力不断,形成了一重重向外延伸的文化涟源:铸成了各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连接成国族的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和世界的中华民族。三者具有并行不悖、互补共生的文化认同。^③

具体到海外各民族华人,他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超越性源于同属于中华民族的原生情感、历史记忆,但又突破了时间、空间的维度。移民、人的流动改变了文化与特定地域的密切联系,

① 苏航:《“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9期。

② 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③ 张小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及其文化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形成更广阔的、差异相遇的文化场域。置身其中的人首先要思考如何保持自身又能适应并融入其中。这个过程必然会发生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的结果也会强化文化认同。因为文化认同本身所具有的同性和差异性,既能唤起对同一文化的集体归属感,又能将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和社会联系起来,于是文化认同的整合意义就会发生作用。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提出了“文化中国”的概念。该观念的形成即是“与海外华裔的生存状态以及后现代视野下‘主体身份认同’思潮的兴起密切相关”。^①加拿大华裔学者梁燕城(《文化中国》杂志的总编辑)就是“文化中国”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他说:“中国是多族裔多文化的结合,同时也有千万计的海外华人,须要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理念,可以用‘文化中国’,以别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国。这‘文化’一辞包括中国所有少数族裔的文化,这文化上的中国,也不限在中国的地域,也是全球华人所重的,代表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精神资源,具有普世价值。当代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理念,就是‘文化中国’,从精神上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带来文化上的多元和谐,建造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②这里的“文化中国”就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中华文化认同的概念,它将全世界的所有认同中华文化的各民族华人连结起来,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远离故土的各民族海外华人那里没有断裂,他们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连贯性中。通过这种内在的历史连续性,我们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海外华人所属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

文化上的认同体现在社会实践中。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践行在社会行为、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如2001年在美国成立的“美国中华少数民族联合会”、2017年在意大利成立的“欧洲中华少数民族联谊总会”以及成立于2007年的“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华侨华人协会”(中国维吾尔族移民组织)、成立于2009年的“哈萨克斯坦杰标华侨华人联合会”(中国哈萨克族移民组织)等,都强调其“中华”“华侨华人”的属性,“美国中华少数民族联合会”将“弘扬中华民族数千来的历史文化,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美国和家乡的发展繁荣,促进中华民族和平统一”作为该组织的重要宗旨。^③

具体到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他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表达可能各有不同,但其与祖籍国的联系,以及对其自身文化符号的保持、认同,则是非常鲜明的。如云南回族移民泰国后自称也被当地人称为“华人穆斯林”。他们以汉语云南方言、居住区中国传统的建筑及装饰、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独有的云南风味饮食等作为他们在泰国表达社群文化的标志,以族群传统立足迁入地并在泰国多元文化环境中保持其鲜明的特色。泰国华人穆斯林社群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在今日泰国社会存在的一种重要象征。^④美国苗族是经东南亚二次移民移居美国,被美国官方确定为与华裔、韩裔等少数族裔并列的独立族裔类别,所以有学者质疑美国苗族的“华人”身份,称他们“几乎不存在华人归属意识,也极少与中国发生社会联系”。^⑤苗族学者刘芳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周边的丹县的苗族家庭和社区做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认为以上观点与事实不符,并指出如同东南亚移民欧美的华人一样,美国苗族对中国原乡有着一种天然的情感,从民族心理认同上仍然认为他们是中国祖先的子孙,这种认同由族群记忆、历史迁徙和文化认同等要素组成和维系。苗族的主体在中国,苗族从中国迁往中南

① 崔海亮:《“文化中国”与海外华裔的中国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

② 梁燕城:《建设文化的共同体——参加政协会议后的反省》,《文化中国》2012年第1期。

③ 向大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三十而立的回顾(1986—2017)》,《八桂侨刊》2017年第4期。

④ 马巍:《差异弥合与交融共生——泰国华人穆斯林的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梁茂春:《具有中国血统者就是华人吗——美国赫蒙人之案例分析》,《华侨华人研究》2012年第3期。

半岛,不会超过200年。美国和中国的苗族至今仍然有着共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字系统,他们彼此认同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追溯共同的民族历史,认同共同的民族祖先英雄,有着内容和形式差别不大的民族节日和风俗习惯。苗族风俗习惯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指路”祭祀,在族人过世时几乎所有的家族都必须为死者吟唱“指路经”。最远的“指路”一直指向泰山。东南亚的苗族由于常年的迁徙,大都遗忘了更加遥远的记忆,他们的“指路经”最终指向中国境内的云贵川地区。美国苗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的一个叫作“都曹”(大朝的意思)的地方。如今美国苗族至少已有三代人,其生活方式、文化认同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已经出现明显代际差异,许多出生、成长在美国社会的苗族青年已经不能使用苗语与老一代交谈,但美国苗族也在努力保持传统文化,并通过在美国的第二次迁徙实现苗族同社区共居。^①

移民中亚的回族(东干人)、^②维吾尔族随身带来了中国农耕文化特长及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是改变中亚农业面貌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为发展中亚种植业做出了贡献。“七河省水稻栽培发展较晚,在那里,是上个世纪(19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中国到这里的东干人和塔兰奇人(维吾尔人)开始推广起来的”。^③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有个乡庄“米粮川”,是由当地东干人在一片荒滩上开发出来的,最初种植水稻,并将该地命名为“米粮川”——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至今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区,还有蔬菜、食品保留着汉语的名字,如韭菜、粉条子,因为这是从中国移民到中亚的东干人最初种植、制造的产品。东干人有深厚的中华情节。至今东干人还将中国称“老家”,将银川称为“我爷的城”。在中苏关系很紧张的时代,东干人自办的报纸及东干语广播节目从来没有出现过攻击中国的内容。他们保持着使用汉语的传统,以旗袍为民族服装,周围其他民族也将东干文化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东干人不是中亚的过客,而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回族——文化的载体定居下来,实践着中华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异域扎根、开花、结果,增进了中亚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中亚广袤土地上的影响力,为加强中华民族与中亚地区的友好关系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其特有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源于其对历史故国的情感,也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在世界的地位密切相关。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海外华人更加有意识地突出其“中国性”及与祖籍国的历史文化联系,这不仅可以加强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同时也可以带来实际的资源。少数民族海外华人许多生活在中国周边地区,有许多人从事与中国的跨国贸易。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比其他人更具优势,而且在频繁的互动中,也增加了其对于“华人性”的坚守。如在老挝,由于中国与老挝的合作不断加深,老挝苗、瑶群体中很多有条件的家庭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云南等地民族聚居区的学校学习中国文化,了解各自族群的民族历

^① 刘芳:《美国苗族——Hmong人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和认同》,调研报告(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子课题),2019年。

^② 苏联20世纪20年代“民族识别”中,将从中国迁居过去的回族移民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东干族”。这些“东干族”往往自称“回民”“中原人”或者“老回”,近些年与中国方面联系增多,也自称“回族”,但他们在公共领域的民族身份是“东干族”,当地其他人对其认知也是“东干族”“东干人”。

^③ Масальский В. И. Россия. Полн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нашего отечества — настольная и дорожная книга для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 Том XIX. СПб., изд. А. Ф. Девриена, 1913, с. 446.文中“七河”以其境内的七条河流(伊犁河、卡拉塔河、毕因河、阿克苏河、纳伦河、萨尔坎特河、楚河)而得名。1924年,中亚行政区域改革,七河省被撤销,该地区的东干人、维吾尔人分别划归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史,同时拿到中国的教育文凭。在云南红河州就有很多老挝苗、瑶族群的留学生在那里学习,在广西民族大学援建的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当中也有很多苗、瑶族群学生在努力学习汉语、汉字,他们多期望能顺利毕业并通过结业考核之后入职中资企业。这些事实都说明,老挝苗、瑶群体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已经形成了较为符合实际的中华文化认同和对中国苗族、瑶族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这种认同正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扩大而有所增强,突显出中华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对于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吸引力,同时这种吸引力、凝聚力又反过来加强了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坚守。

四、中华文化提升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凝聚力相关研究的意义

加强中华文化提升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凝聚力的相关研究,建构中华民族整体观之下的海外华人研究体系,既可以推广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理念,也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在国际交流及文化传播、经济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树立中华文化包容、博大、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及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贡献。

(一)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

当今世界,一方面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加速,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都纳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世界也成为文化的“竞技场”,特别是会成为“强势文化”扩张甚至霸权的有利场域。另一方面,其他民族、国家也在这个过程中会思考如何在被“强势文化”所界定的“标准”下保持、发展自身文化的特质,以此加强文化承载者的归属感,实现文化的整合并彰显其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说,全球化进程给文化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仅可以敞开一个“各种文化的万国博览会”,而且也是各种不同文化抵牾冲突的场所;全球文化并不是一种趋同的文化,而是差异、权力争斗和文化声望的竞争将在其中进行到底的一个场所。“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后果——日益增长的接触与世界的有限感,即世界即是一个地方的意识——使得从不同民族与文明传统的立场给世界的意义赋予的不同阐释之间发生了多样性的碰撞。在全球舞台上进行对话的频繁程度与方向的多元性,使得很多民族国家发现再也难以淹没别人的声音或者不顾别人的决定之后,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立场”。^①

面对全球化,置身其中者都会深刻感受到文化的存在与文化的力量。所以当我们从全球化研究各民族海外华人时,既要“从全球化的文化”的视角,看待华人文化如何经过文化的适应而落地生根的过程,同时也要从“文化的全球化”的视角,看待各民族海外华人作为“有根社会”(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中华文化“遍地开花”的过程。而后一点尤为重要。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少数民族海外华人所以能够在融入异国他乡时保持自我,正是他们始终将中华文化作为其共同的传统和精神家园,而聚合着中华各民族文化精华的中华文化也在客观上满足了各民族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依的需求。我们应该重视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文化“软实力”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以中华文化的凝聚力聚合各民族海外华人共赴中华发展大业,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地位及影响力。

^① [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杨渝东译:《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二）对于树立中华文化包容、博大、积极向上国际形象的意义

中国的崛起引发了所谓“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一方面是为战略上遏制中国而做的舆论准备,同时也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①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气质、“有容乃大”的胸怀及“求同存异”的理念是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信的出发点。遍及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他们以对于中华文化的守护、传承,将“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中华文化播撒到海外,而世界也因为少数民族海外华人,更多地认识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彩。中华文化的多元色彩,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和而不同”思想带给世界的贡献。它彰显了文化的开放性对于人类和谐、和平发展的重要价值。

（三）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理论建设的意义

当今世界,跨文化是一种生成性现实。各民族海外华人以其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实践,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延伸、跨越,并在更广阔意义上形成了中华文化“多元性”与“一体性”的辩证统一。这一方面说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跨越国家、民族的特性,并成为全世界华人的共有标识,同时也说明中华文化具有稳定、持久及由“多元一体”形成发展模式而生成的共融、同构气质,这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理念和文化资源。所以当我们跨越国家的框架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时,不能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空间扩展,而是应该将其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发展的背景下,放在中华文化对于凝聚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重要意义上。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由各民族“多元”文化组成,少数民族海外华人虽身在异域、他国,但他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从更高层次上讲也是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正是“多元一体”理论跨越了国家的边界仍然能够得以阐释的原因所在。各民族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观念的传播者,并以其文化实践保证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之存在、发展。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理论上、在更广阔视域下讨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对于“多元一体”理论建设的意义,而且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展现中华文化的特质、内涵及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价值。

总之,全球化下文化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日渐凸显。以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用中华文化的积累与智慧贡献人类文明发展,这应该成为中华民族面对时代挑战的“文化自觉”。当我们从海外华人视角关注中华文化建设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时,只有正视少数民族因素,才能全面展现中华文化“多元和合”的强大力量及各民族共筑中华的历史和现实,也不会给国内外民族分离主义及分裂势力造成可乘之机。所以,研究中华文化对于提升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凝聚力的意义,就是要彰显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丰富内涵及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意义,并通过阐释各民族传承、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增强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海内外各民族中华儿女同心协力,共同为中华民族繁荣发展和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83—284页。